

制造好人

陈集益 - 作品

非外借

张鸿 / 主编

现代性五面孔 3

Making
Good
Peopl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制造好人

陈集益
— 作品

Make
Good

Good

People

现代性五面孔 3

张鸿 /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造好人 / 陈集益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4

(现代性五面孔. 第三辑)

ISBN 978-7-5360-8876-4

I. ①制…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994号

出 版 人: 肖延兵
责任编辑: 黎 萍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介 桑

书 名	制造好人 ZHI ZAO HAO 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125 1插页
字 数	180,000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

——陈集益

(自序)

现代性于我是一个经常听说但又不太清楚具体含义的词汇。因此谈论这个词我会感到心虚。当然，在与人谈论文学话题时，偶尔也会从我嘴里冒出“现代主义”“现代派”“后现代”之类的词，心里直犯嘀咕，它们都有什么关联？我并不是一个喜欢钻研的人，比较害怕读理论书。有一阵子，我常常从评论家评述别人的作品里看到这个词，通过间接的理解，推测现代性可能跟工业文明、科技进步、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行为方式、精神追求与传统有别。总之，我隐约感到它是一个与现代社会、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产生共振的词。说这番话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释现代性的概念究竟怎么产生，想说明它的特点与意义，而是当我得知自己被选为“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的作者后，感到荣幸的同时也曾

琢磨过我的小说与现代性是否存在暗合的问题。所以当我拿起笔，还是希望从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来回顾我怎么就写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作品，借机也梳理一下我的写作历程、追求，以及得失。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保守的人，穿着打扮显得土气，言行举止一直没有学会城市人的那套样式，加上我这土得掉渣的名字还有大多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如此这般，往往让人以为我就是那类擅长写“寡妇偷情”“妯娌吵架”“公公扒灰”的乡土作家。事实上，我并不喜欢那样的故事，尽管在农村确实存在那样的人与事，尽管小说是可以复制现实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作家们更不该去渲染农村中那些粗鄙与低俗的内容，或者一转身，再将炊烟和老黄牛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符号来写。不管怎么说，写作还是需要一些新的、独到的发现。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在乡村看到癫狂、荒诞、异化、梦魇，看到这个时代投射的阴影产生一些稍微“现代”的思考呢？我以为乡土也好，城市也罢，仅仅是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载体，我们需要在惯常的认知上写出新的思想、新的意义。

收入本书的《制造好人》，故事虽然“发生”在我的家乡吴村，但是很显然，它想要表达的东西远远大于一个村庄的范畴。与其说这是一个发生在小山村里的故事，不如说这是象征一个国家或者一段历史的寓言，我尽可能地融入了政治层面、信仰层面、文化层面、人性层面的思考。《驯牛记》中，那些养牛驯牛的过程尽管花去很多精力才得以准确描述出来，事实上，我要写的重心既不是农事经验，也不仅仅要塑造一头桀骜

不驯的牛，我要说出的是被驯服的悲哀，驯牛史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规训史。而《金塘河》的写作，一方面叙述模仿了河流的流淌，时而流畅自然，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惊涛骇浪，但是这条河流终将要被下游的水库阻断，就像小说中的父亲一心想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终将破灭于寄托着美好愿景的洞中。整篇小说中，我最看重的就是山顶上那个洞的出现，如果说这篇小说确实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虚妄之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当我们挖洞越深，就越爬不出可怕的漩涡的裹挟。《狗》差不多也是这样写成的，只是背景放在了城市。

除了收入本书的这几篇，我还写了大量这类风格的小说。比如《野猪场》里野猪泛滥成灾，可以看作是欲望和权利失控祸及民生。《吴村野人》写的是文明人与野蛮人杂交后，上演了一出愚昧落后和现代商业社会畸形结合的闹剧。《人皮鼓》中我把“剥人皮”这个极端情节当作某个社会转型期的征候来写。因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兴的老板阶层中的腐败分子对民工阶层的剥削压榨，其原始积累过程，我以为就是“剥人皮”的过程。在《杀死它吧》中正是那条血泪筑成的大坝破坏了河流的自然流淌，人工水库的出现导致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所有人最终陷入绝望的境地。又比如《第三者》中患病的前夫、无法抛弃前夫的妻子、为了照顾前夫和不让家庭崩塌而特意招回来的现任丈夫，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三者之间相互抵触相互折磨，那个忍辱负重的妻子所承受的苦痛，当她每天面临两个丈夫的蹂躏，我们何尝不正经历着类似的欺压？

有评论家看过我的大部分作品后指出，我擅长把人物推到

一种面临选择时两难的绝境，“阅读时我真是替人物担忧，怎样做都不行”，又说，“人物往往会有点偏执，怀着美好的愿望出发，但往往走向覆亡的悲剧”。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困境。我常常为自己的无能、懦弱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感到无力，感觉找不到出路，心怀巨大的悲凉与沮丧。我不知道当我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着这样的处境，这样的主题，这样的情绪，是否有点偏执。但是，当我们感到难以言说时，我以为言说本身就是价值。我曾写过一篇《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从没有忘记我最初的写作动机，它是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还有那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想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个时代和裹挟其中的人，尽管由于才疏学浅，我既理不清这历史，也无力提出什么问题，我能做的仅仅是忠实于我的记忆、在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或许，我笔下呈现的世界很多时候是黯淡的、压抑的，甚至是残酷的，像《往事与投影》中充满了疯狂、暴力与死亡，《哭泣事件》《吴村野人》《制造好人》中充满了躁动与不安，但是，这的确是我真实的生命体验，而且自认为这样的体验至少在同龄人中还没有很多人去写，是值得我写的。

好的小说（当然不是全部）我以为是不能离开历史，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的，就好比我们的生活脱离不开政治的影响。年轻的时候，我曾喜欢花样翻新、手法诡变的“先锋文学”，甚至喜欢过单纯游戏性质的文字——事实上现在也还爱读——只是人到中年以后，就像对自己的家庭有了更多责任

感，我对写作的态度也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前几年我读到杨显惠的作品，感到震惊的同时不免感叹，如果当年那些天才作家前辈倡导的先锋文学在强调“怎么写”的时候，不要有意疏远“写什么”，那么在我们国家就可能产生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说不定现在的文坛就不是这么个格局。“写什么”和“怎么写”，我以为是可以在一篇小说里同时得到解决的，它们不是矛盾体。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现实题材故事中传达我的思想和立场，也试图从先锋文学那里借用一些技巧（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反叛意识）用于现实主义写作中，一方面遵守着传统写作的“小说三要素”，一方面通过隐喻、象征、变形、寓言化等等手段，抓取时代征候，反映时代洪流中的人物生存处境、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状态。

福克纳曾经说过：“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这句话涉及诗人和作家的素养与人格。而小说是要体现作者审美取向、价值观、人格高下的一种文体，当一个人面对严峻的现实和苦难的人民熟视无睹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作品也将是可疑抑或打点折扣的。

为了完成这篇自序，这两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只是合上书页，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说，我只断章取义地记住了福柯的几句阐述。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是一种“哲学的质

疑”，亦即对时代进行“批评性质询”的品格。——或许对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评的精神，可能这正是能被我记住的原因。尽管，我对现代性依然一知半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

是为序。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目 录

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自序）/ 陈集益 / 1

制造好人 / 1

驯牛记 / 49

金塘河 / 105

侍候 / 167

狗 / 197

特殊遭遇 / 223

打开时代与历史的魔盒（访谈）/ 陈集益 张鸿 / 237

制造好人

制造好人的机器真的要运来吴村了，这事让我很是紧张。这机器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制造出好人，是怎么制造的，我一概不知。接到通知时，乡里的刘干事只说有一台榨制什么的机器要运来吴村了，务必配合省城来的朋友搞好这次工作，他们是省里什么协会某某主席的哥们。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主任，可我要接待的是省里来的、什么主席的哥们，这是多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答应刘干事说：“放心吧，刘干事，我会好好招待客人的。山里需要榨制的茶籽、桐子、油菜籽多着呢，机器不会闲着的。只是，收费多少合理呢？”刘干事说：“从省里运来的可不是榨油机，而是一台制造好人的机器。陈哥你不是在装聋作傻吗？”

我蒙了，这样的机器于我而言闻所未闻。在我的追问下，刘

干事在电话那头不痛不快地说，那机器其实是省里几个艺术家搞的什么行为艺术，他们要找一个地方实验“制造好人”，托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我们这偏僻地儿。我不清楚行为艺术是个什么玩意儿，当年在学校，艺术总与美术、音乐、文学联系在一起，那是非常高深、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但是直觉告诉我，“制造好人”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情，难道好人是能够制造出来的吗？我把我的想法跟刘干事说了。刘干事说：“陈哥，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嘛，制造好人是一项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你有听说吗？我查了资料，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拿身体表演的艺术。大概跟杂耍、杂技，移形换位、大变活人差不多吧……”

在这之前，我接待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老干部来山里疗养的，有专门驱车到井下村再步行上来吃野味的，有本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带着学生来写生的。但是恕我直言，我不太想接待这次要来的人，省城那么大，难道就没有这帮猢猻的用武之地吗？干吗跑到大山里来？但是我也不想得罪刘干事。尽管他在山乡也就是跑跑腿的角儿，恐怕连古戏中的九品芝麻官的部下都算不上，但是你得明白，当他通知一个什么事情要我去做的时候，他代表的是整个山乡政府。一旦他把我拒不接待贵宾的事情上报给乡长，那么我就再也不可能审批出木材采伐许可证了。而我，那几年赚钱的主要方式是贩卖木材。所以我挂了电话，就决定把我们村的大会堂腾出一个地儿来，同时差几个青壮年去把机器抬回来。

那时候绕着山乡水库修建的公路虽然延伸进了大山，山里人来往于山乡政府和汤溪镇方便多了，但是由于资金匮乏公路修到井下村就搁置了。从井下村到吴村有五里地的泥泞路，该路修筑在溪边田坎上，就像被洪水冲上岸的一根烂猪肠——我派去的几

个人在这路上奋战一天，庞大的机器压断了好几根硬木杆子，还把一个人的脚趾砸伤了，天黑之后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家，每个人身上披着一层白刺刺的盐。第二天，才有机灵人带了几根碗口粗的圆木垫在机器下面，圆木随机器的推移一根一根交换着当轮子使用，这样才将机器一步一换地挪到了村口。

机器一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把冷冰冰的铁制椅子，椅子靠背上方悬着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子上有密密麻麻的电线、管线、电容、小零件，其中有一部分电线管线连着机器的第二部分——那是一个立式的柜子，上面装满各种奇怪的仪表、指示灯、按钮，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整台机器的控制台——而机器的第三部分是横卧的，它状似一口密封的棺材（后来知道它叫制造舱），机身和机盖都由乌黑发亮的铁板焊接而成，焊接处可见成排的焊钉，好似一只只黝黑发亮的牛虻虫；它是三个部分中体积最大的，应该也是最重的，看样子完全可以躺下一个人；比如，人头搁在机器宽的那一头，人脚搁在机器窄的这一头——它的两头，都从里面伸出来很多管子，管子颜色和质地各不相同……

不瞒你说，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山乡初中毕业的，在当年的吴村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可是由于回村务农多年，泥土代替了课本，我已经把有限的一点物理化学知识都忘掉了。我看不懂它的构造原理，就像我想不明白：那几个省里来的獠獠为何要制造出这样一套怪模怪样的机器，它到底干什么用？真的能制造出好人？还是仅仅用于“移形换位、大变活人”的道具？——我仔细地端详，它稳健、牢固、严实又不失实用，我想当一个人躺进这样一个冰冷、压抑、封闭的容器，他一定会感到无端的恐

惧。那么村里谁会第一个躺进去供他们做实验呢？

我有些后悔了，后悔答应刘干事接待这帮子人。

他们一共四个，三男一女，男的两个留着长发，有一个染着烫过的黄毛。他们穿着花花绿绿或者方格子衣服，戳有破洞的牛仔裤紧勒着结实的屁股，反而那女的剪了一个毛寸头，穿的衣服是亚麻布的，松松垮垮，看不见胸也看不见臀。他们讲普通话，一个戴眼镜，一个戴墨镜，一个扎耳环，一个手持摄像机。他们对农村充满好奇，据说大伙儿嗨哟嗨哟搬运机器的时候，他们在田野里为看见一只蝴蝶而欣喜。当机器运抵目的地，我慌慌张张跑去迎接，满脸堆笑，看见他们正围着一堆牛屎戳戳捣捣，嘻嘻哈哈。

我本打算安排他们去我家里吃住的，就像以前招待城里来的老干部那样，杀鸡宰鹅下河摸鱼。看见他们那副相互打闹、对我有失敬重的样子，就改变了主意。

我们村的大会堂是一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土木结构建筑，在大集体时期，社员们在这里吃过大锅饭，开过会，观看过样板戏，那时候常有驻村干部在这里居留，生火做饭。现在它破败了，不过用条石垒成的大门顶上，那颗红五角星依然清晰，墙壁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也没有褪去。我安排他们住在大会堂里。然后返身去家里为他们弄点吃的来。

当我背着米和菜回来，在大会堂门口，出现了多年前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那般的场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黑乎乎的门洞里拥出，将大会堂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人是来做杂技的吗？这是啥玩意儿？干什么用的？尽管村里人早已听说有一台制造好人的机器要运到村里来，可是面对实物谁都不愿或者不敢相

信这是真的了。此刻为什么要制造好人的疑惑，就像一块靠近火光快要流脓的冻疮，奇痒无比，而我的回答却挠不到痒处。因为我并不比他们了解得更多。

第二天，机器就嗡嗡嗡地响起来了。机器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有六七种颜色，颜色亮起时还会发出嘀嘀声。那四个人早早地换上白大褂，在大会堂里忙乎着。他们用一块印有宣传图样的布帘在大会堂中央隔离出一个工作的区域，几张曾经用于开会的桌子上摆满了貌似医疗器具的东西。一些人围着看布帘上的孔繁森、焦裕禄、邱少云、黄继光、雷锋、董存瑞……以及“讲道德、做好人、树新风”“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等等标语。就在标语旁边，另一些人在叽叽喳喳着：井下村就不造吗？为什么要到我们村来造？我们没有理由成为试验品呀。

我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能说出：这是省城什么协会主席的什么哥们在搞什么行为艺术；因为刘干事有交代，在机器撤离吴村之前是不能将真相告诉村里人的，否则实验无效，数据不真实。还说：只要做到严格保密，机器撤离后他们将给予每个进入机器的村民一百元钱奖励——这是一笔不小的报酬！对于那时候的吴村，可以让一个老人吃上一个季度的大米。这事看起来不坏，到任务完成、分发报酬之日我再向“好人”们摊牌即可。更何况，这次接待任务完成之后我个人肯定也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多少能从山乡政府批到几百立方米的树卖吧？

这么多年来，我确实每年都能从山乡政府拿到砍树指标，而别人是不允许私自伐木拉到山外去卖的。就算伐了，请不来木材检查站的公职人员在每棵树上敲上检查站的钢印，是运不出山的。其中的互惠互利及微妙关系；也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所以

临近中午，我发现大会堂里除了一些孩子追来跑去地玩游戏，大人们大多去田地里忙活了，留下几个老人、懒妇与闲汉也没有一个肯把自己“交出来”——我就有些不悦了。我所急的，倒不是村里人拿不到一百元钱、丧失一次进财的机会，而是怕制造好人的机器过于被冷落，“好人”一个都“制造”不出来——到时刘干事要问罪于我。

“社会需要好人，好人需要制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好人。只有好人越来越多，社会才能越来越好……”那几个所谓的艺术家已经不像昨天那般轻浮了，他们在白大褂之外戴了“制造好人”的红袖套，坚持不懈地宣扬着制造好人的必要。但是那些留下来仅仅为了等着看热闹的听众一脸茫然，他们几乎不听或者听不懂普通话。我想总得有个人带头走进机器，至少有一二十人响应才好。我说：“你们能不能严肃一点，排好队配合一下制造好人的工作？”我是用商量的口吻说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很好了啊，从不干坏事，要是个坏人都敢坐在这里吗？”

我说：“要是好人就更不怕进机器了。”

他们说：“光把我们变成好人，别人都不变，将来不是明摆着让人欺负吗？”

我说：“凡事总有先有后嘛，做好人有什么不好？”

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先躺进去试一下？”

我被说得哑口，心虚地溜了。我想实在不行，就由我来做第一个试验品吧！——如果制造好人诚如刘干事所言，仅仅是在

特定时间地点拿身体表演一番的艺术，人进去再出来以后毫发无损，这又有什么？可是，就因为有了要做“第一个”的想法吧，我对那台机器感到莫名的忌惮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它是真的；如果单是行为艺术的道具，何苦造得如此精密复杂呢？

二

我想说这是上级下达的命令，是政府出了政策，只要提到“政策”，没有人不害怕的，村支两委班子一定会依法执行。可事实是没有这样的政策，我拿不出红头文件，那就只能动员。我们村还保留大集体时期的扩音喇叭，一个装在大会堂屋顶，一个装在村中央榛子树上。我在村委会楼上的播音室里对着麦克风吹了一口气，立刻就听到大会堂屋顶上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呼吸，我吓得僵在那儿，鼓了几次都没有勇气把我的动员令颁布出去。

我本质上是一个胆小谨慎之人，之所以会轮到我担任村主任，可能仅仅因为我是村里脑子还算活络的“致富能手”之一——以至于我的职务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而是乡长直接任命我来当的。我几番推脱，说我不愿多事扮不来白脸黑脸，乡长就生气了，说你不当让谁来当？你要让我们进一趟山办一个事，连一个歇脚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吗？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当时情况下做村干部是不给工资的，村里某些干部精得像猴，不愿倒贴钱供乡里人吃喝……我只好说：“那就我来当吧！”

此时，我还没想好怎么样才能让村民们自愿自觉地配合“制造好人”，就像有一年有医疗队来山里开展义诊活动，他们所表现出的参与热情一般。我知道，唯有利益的驱动才能让他们表现